

唐研究基金会丛书

唐研究论文选集

〔日〕池田温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唐研究论文选集/[日]池田温著;孙晓林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12

(唐研究基金会丛书)

ISBN 7-5004-2481-7

I. 唐… II. ①池… ②孙… III. 古代史-研究-中国-
唐代-文集 IV. K242.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14569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北京兆成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7.5 插页: 5

字数: 439 千字 印数: 1—3000 册

定价: 33.00 元

唐研究基金会丛书学术委员会

主任 罗杰伟

委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世长	王小甫	王 尧	王克芬
王炳华	朱 雷	齐东方	李斌城
吴宗国	张 弓	张国刚	金维诺
郑学檬	胡 戟	荣新江	姜伯勤
徐苹芳	韩 伟	葛承雍	葛晓音
傅璇琮			

秘书 罗 新

唐研究基金会丛书缘起

现在，展开在您面前的这本专著，是唐研究基金会丛书的一部。后面还会有很多很多，都是中国学者的心血和骄傲。

唐研究基金会 (the Tang Research Foundation)，是罗杰伟先生 (Roger E. Covey) 于 1992 年在美国芝加哥创立的。罗杰伟先生是一位年轻而富于才华和热情的美国汉学家，怀着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唐代文化的热爱和关怀，他弃商从学，毅然决然地走上艰苦漫长而又引人入胜的求学和治学之路——他决定把自己的后半生献给研究中国文化、加强中美两国文化交流的崇高事业。在此以前，他先后取得电子计算机学士和工商管理硕士 (MBA)，并白手起家，创立了系统软件联合公司 (SSA)。在十多年的时间里，SSA 已成长为全美最大的应用软件公司，被 Fortune 杂志列入美国发展最快的 100 家公司的排行榜。就在 SSA 事业的高峰期，1985 年，罗杰伟先生到敦煌旅行。莫高窟的千古魅力深刻地影响了他，从此他开始了走向东方、走向中国的人生道路。进入 90 年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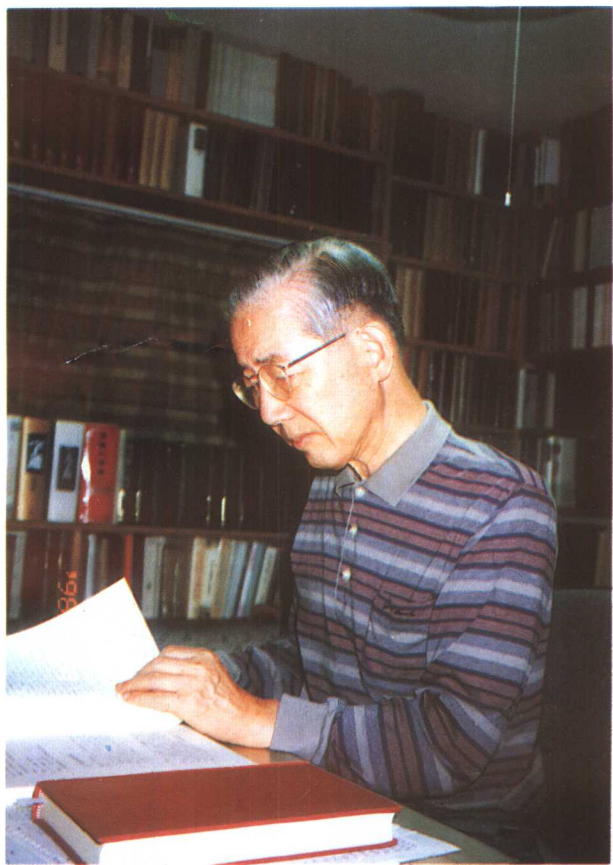
罗杰伟先生在把 SSA 的事业带进中国的同时，他本人却决定弃商从学，迎接新的人生。

罗杰伟先生不仅自己全身心投入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学习和研究，他还创立了唐研究基金会，致力于鼓励和支持中国大陆的专家学者的研究，特别是对唐文化各领域的深入研究。1993 年岁末，罗杰伟先生在北京赛特大厦与北京部分唐史专家亲切会面，介绍唐研究基金会的成立情况及其宗旨，并诚恳征求对基金会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很多学者都谈到了资助学术专著出版的问题。这一建议被罗杰伟先生愉快地接纳了。这就是唐研究基金会丛书的由来。从 1994 年起，唐研究基金会将每年资助若干部优秀的学术专著出版，资助范围包括唐文化研究的各个领域（历史、考古、艺术、文学等），受资助的专著都列入唐研究基金会丛书系列。为了保证这一工作的学术性和权威性，聘请若干名对唐文化研究卓有建树的学者组成丛书学术委员会，负责推荐和审批资助对象。感谢学术界的热情支持与合作，目前，这一工作已经走上了正轨。

长期以来，我国学者在极端不利的社会环境下从事艰苦的研究工作，不断取得宝贵的学术进步。近十几年的情况虽有很大改善，但仍然不尽如人意。在这种情况下，唐研究基金会的成立和唐研究基金会丛书的推出，当然是有积极意义的，值得我们各尽所能，把它办好。

罗 新

1994 年 6 月于北京



编 委 会

(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

- | | |
|-----|------------------|
| 高明士 | 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 |
| 韩 昇 | 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 |
| 黄正建 |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
| 荣新江 |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执行编委) |
| 孙晓林 | 北京图书馆副研究馆员(执行编委) |
| 赵和平 |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

论池田温先生的唐研究

姜伯勤

一 前言

池田温先生于1983年以大著《中国古代籍帐研究》获日本学士院赏。学士院赏是日本国学术界一项崇高的奖项。早在1934年，仁井田陞先生曾以《唐令拾遗》一书获得日本学士院恩赐赏，由此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东京大学唐研究的悠久的学术传统，更可看出其唐研究传统业已显示出不同发展阶段的特质。

研究池田先生的唐史学宜由分期研究与分类研究两方面入手。《池田温教授主要著作略目》^[1]可用于编年及分期研究。而大津透先生《池田温先生著作分类目录》^[2]可用于分类研究。大津透先生将论著分为：A. 均田制、籍帐、社会经济史；B. 氏族·官僚制；C. 敦煌吐鲁番学、出土文物；D. 国际交流；E. 律令法、唐日比较文化；F. 史籍；G. 其他。这一分类是我们进一步研究池田先生学术工作的先导。

关于池田先生的书评，自杨联陞^[3]、砺波护^[4]诸先生以来，不胜枚举。近年，周一良先

生将池田先生的《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和《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称为“巨大完备的结集”^[5]。高明士先生大著《战后日本的中国史研究》^[6]、荣新江教授近撰《敦煌汉文文献》（《讲座敦煌》第5卷）书评^[7]等，都对池田先生的贡献做了深入的分析。

受上述论著的启发，本文拟讨论以下两个问题：

1. 从学术源流考察，池田先生在继承前辈传统时，做出了哪些新的业绩？

2. 从中国唐史学的视角，池田先生的唐研究对中国唐史学界的未来进展有哪些启示？

二 从唐律令制研究推展到 唐礼制的研究

1992年，池田先生主编了《中国礼法与日本律令制》论文集。本书的书名即已标明，池田先生业已把唐代律令制的研究进一步伸延到唐代礼制的研究。兹论述以下三点：

1. 池田温先生对于把律令制延展到礼制研究的贡献。

本世纪初，1904年，中田薰先生发表了《唐令与日本令的比较研究》这一宏文，池田先生说，这是为“日唐比较法制史带来了纪念碑式的业绩”^[8]。可以说，中田先生此文标志着20世纪的唐史研究是以律令制为重要课题的世纪。

在新世纪到来时，池田先生期待着日本唐史学界对唐礼研究作出新贡献。1992年，池田先生在《日本的唐史研究——近年来的动向》一文中写道：具有广阔意义的礼制的研究“正在提供新唐史的认识”，“对于开垦这一在中国本土上几乎还没有着手的领域，满怀着期待”^[9]。

池田先生对唐礼的研究不自今日始。早在1972年，池田先生在汲古书院出版了《大唐开元礼（附大唐郊祀录）》一书。池田先

生认为,礼“称之为汉民族数千年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结晶的精华亦不为过”^[10]。这一论点启发我们认识到:一方面,由于当代人类学、民俗学等文化研究向历史学的渗入,另一方面,也由于尼采以后西方宗教的式微及社会失序现象的频现,“礼”作为节制人类行为而使之有序的东亚文化的精华,必将得到未来学术界的广泛研究。

1981年,池田先生又写了《〈大唐开元礼〉第二版附记》,辨明四库本与他自己影印的洪氏公善堂刊本是两个不同的底本,四库本错讹较多^[11]。在《唐令与日本令——关于〈唐令拾遗补〉的编纂》^[12]一文中,池田先生以唐令与开元礼的序例为中心,论证了唐令与唐礼的密切关系。1929年,泷川政次郎氏在《唐礼与日本令》中比较了唐礼与日本令的关系,仁井田陞先生继踵而上。池田先生等人编纂的《唐令拾遗补》将唐礼中唐令“取意文”收载,如祠令、衣服令、假宁令的相当条文都予以增补。池田先生指出,“(开元礼)序例杂制,将十数条乃至数十条归纳收载,此一个案,极为贵重,值得慎重讨论”。又说,“可以留意到,序例杂制的排列与《六典》礼部的收载相当之对应”,“序例与《六典》一致而与日本令有相异之处”。

池田先生的结论是:调查《开元礼》序例杂制排列顺序的结果,与祠令、卤簿令、衣服令本来的顺序相反,丧葬、假宁令显然不是沿袭令的摘录排列,可以认为令与礼的构成是不同的。

令与礼既相关,而其构成又不相同,这就为我们留下了今后研究的广阔前景。

2. 池田温先生对于分析唐令与日本令的差的贡献。

在中田薰一仁井田陞先生时代,由于注意到唐令是日本养老令的母法,因而相当注意两国律令中的相同部分,并进行了以一部分养老令为基础的唐令复原作业。

池田先生及其同道的新贡献,是重新对这些工作加以厘定,并

发现了其间的差异。在《唐令与日本令》一文中，池田先生指出，在《唐令拾遗补》编纂作业中，注意到唐令与日本令的差异；关于篇名与篇次，试图对永徽令的篇名篇次进行复原，将浅井虎夫氏的表增订为三十至三十二篇，与日本令比较，增加坂本太郎氏所说若干；在《唐令拾遗》篇目配置中，调换入医疾、捕亡二篇，并试图将仪制令第四、五条如日本令的顺序排列。《开元礼》与《六典》的引用顺序，其相对应的场合，是确认令的本末顺序的有力线索。《唐令拾遗》依据《养老令》的排列顺序，应该考虑唐代文献引唐令的状况而考虑唐令的排列顺序。对于假宁令的家祔庙条第一条的顺序，现在即改变了原来《唐令拾遗》的配列。

池田先生较前代学者更有力阐明的一点是，唐代中日两国的法律表面上相同，而实际上是相当不同的。池田先生指出：“如以日本《养老令》与《唐开元前令》作比较，就能看出，两者在编目名称上大体是一样的，然而在个别细部上又有许多差异，如唐‘官品令’，在‘养老令’中称‘官位令’，唐令中将官僚职员分作三师三公台省职员……诸令，在‘养老令’中对中央官僚职员则没有区分。”^[13]8世纪，日本第一次有了铜钱“和同开珎”，但数量不多，流通范围有限，一般官僚也不用钱作俸禄，而用谷和农具作俸禄。而在唐朝，官僚们一般是以“开元通宝”计算俸禄的。

日本官僚的服色亦模仿唐朝。在唐朝，从一品到九品，每一等的差别并不大，而在日本，品位的差别则大得多。

日本的位田制度是模仿中国官人永业田的。日本田制与唐朝田制不同，日本班田制中只有“口分田”而无“永业田”名目，日本“口分田”是水田，而水田面积很少，日本的位田相当于唐的“官人永业田”。唐有资荫制度，日本世袭制中资荫制度更重要。

虽然日本的法律制度有很大部分是仿唐的，但是，我们必须有这样的认识：由于日本和中国的差异，由于社会条件上有很多不同，就决定了日本的这种模仿是有限的，必须改订制度以适合

日本社会的现实。^[14]

所以，要研究中日两国的律令，不仅要研究其相同之处，而要进一步深入下去，还必须研究其不同之处。这样就会发现：中日两国的法律表面相同，而实际上是相当不同的。

对于中日律令制的比较研究，经常容易犯的失误是看不到差异。池田先生对差异的解明，标志着这一研究中的新阶段。

3. 对唐令文书研究与史源开拓的新阶段的贡献。

仁井田陞先生代表了继承中田薰先生遗志整理唐令和敦煌吐鲁番法制文书的一个伟大阶段。仁井田陞先生在英国考察文书时得病，不幸于1966年逝世。

作为法制史学会的研究动向报告，池田先生于1978年与冈野诚先生合著《敦煌、吐鲁番所发现有关唐代法制文献》，系统介绍敦煌吐鲁番出土的法制文献。其中《现有资料概览及补述》预示着唐令文书整理的一个新阶段业已到来。^[15]

1978—1980年间，池田先生在东洋文库与山本达郎、冈野诚等先生共编《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集》，I，《法制文献》英文版^[16]。本书对敦煌吐鲁番所出诸断简的整理达到了崭新的水平，(B)册图录出版于1978年，(A)册导论与录文出版于1980年。

1986—1987年，池田先生又在东洋文库与山本达郎先生共同出版丛书第Ⅲ卷契约，(B)册图录于1986年出版，(A)册导论与录文出版于1987年。^[17]

在山本先生的指导下，以池田先生为代表的这个整理法制文书的新阶段，显示了日本学者的锲而不舍的实学精神与长期分工协作的团队精神。例如，从永徽令卷末的拼合可以看到日本学者坚韧不拔的努力。S.11446号断片(Vs)为1980年由土肥义和先生旅英时在英国斯坦因未编目文书中发现。而S.11446号断片4为冈野诚先生1984年旅英时于英伦所藏《二入四行论》背后发现，

冈野诚先生 1986 年在广元中国唐史学会年会演讲曾论及此件。P. 4643 号文书则系依那波利贞先生 30 年代所发现永徽令文献推补缀合。职员令卷末的拼合是本世纪初王国维、狩野直喜、董康、仁井田陞诸先行者关于《职员令》的卓绝研究的一个光彩继续。

池田先生指出，东宫诸府职员令，现存 192 行（+卷末编纂列位 22 位），存永徽令卷六约四分之三，不用说，这就是直接依存唐令原型的最重要资料。可以认为，日本大宝养老令以永徽令为母法。所以，在唐日两令比较之时，本残卷作为基准的作用诚然颇大。^[18]

1978 年，池田先生发表了《敦煌本判集三种》，指出 P. 2593 号《判集》不是《龙筋凤髓判》，而 P. 3813 号《唐判集》可与《龙筋凤髓判》相比较，文章平俗，属 650 年至 7 世纪后半期。另外，P. 2754 号《安西判集》所引律令相当于永徽令，属 7 世纪后半期。值得注意的是，敦煌本 P. 3813 号《唐判集》与日本《令集解》所引《判集》相符，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

池田先生指出：初唐时期，当“律、令、格、式”成文法体系完成时，对法治的强烈志向是一种时代精神。日本、新罗模仿唐朝官僚选任制度的外形，但在考试中试判一般尚未被采用。^[19]

1980 年，池田先生又主编了《东洋文化》60 特集《律令制的比较史研究》^[20]，1981 年编成、1987 年刊布池田先生作序的《唐代诏敕目录》^[21]。编纂缘起指出，开始整理卡片的是已故铃木俊先生（1904—1975）。唐代诏敕有册书、制书、慰劳制书、发日敕、敕旨、论事敕、敕牒七种，又有诰、令、口敕、手敕等种种叫法，经过编年整理的目录，可当年表用。本书由 13 人协助收集卡片，作为东洋文库唐代史研究委员会的事业而进行。

池田先生密切注视着中国法制文书的发现和研究的每一步进展。如 1986 年在《关于〈唐令拾遗补的编纂〉》一文中指出：“近

年来王永兴氏等中国学者的追求与各方面的努力，层出积累。”注意到王永兴先生1982年发表的《唐田令研究——从田令和敦煌文书看唐代土地制度中几个问题》（见《纪念陈垣诞辰百周年史学论文集》），1984年发表《唐代法律资料介绍》，敏锐地注意到许福谦先生关于72TAM230墓46（1）、（2）号文书的研究，并判断出该件“大抵是包含仪凤年间令旨的诸事条（度支、金部旨条）”^[22]。

1985年，池田温先生发表了《吐鲁番出土唐仪凤年间度支金部旨条——大谷文书简介》^[23]，文章肯定了陈国灿先生将吐鲁番230墓出土案卷残片（六）和大谷4940、4937号文书拼合的研究业绩，指出“其说确当，无存疑义”^[24]，陈国灿先生还指出上引72TAM 230墓46（1）、（2）号文书诸条开头皆标“一”字，遂于大谷文书亦发见同类残片。文章又报道了天津透等先生对大谷文书残片的继续调查。通过大谷文书有关断片的拼合复原，指出“许氏研究诸条及大谷文书中之几件中的诸条，都属原来仪凤三年十月户部谨启中之内容，皆关国家财政而度支、金部所管也”。又谓“仪凤度支金部旨条之出现，启示唐代前期财政运用的实态颇详”。本件所载又不见于传世文献，“是本残卷特别宝贵之理由”。池田先生的大文，表明了近年中国吐鲁番新出土文书刺激下中日两国学者互相激励、推进研究的佳话，而池田先生正是这一协力的推进者。

1993年，池田先生在滋贺秀三先生编的《中国法制史（基本资料的研究）》一书中写作《唐令》^[25]一章，可视为先生对唐令研究的一次小结。日本法制史学界俊彦辈出，从滋贺秀三先生到冈野诚先生诸位。池田先生与其同道在仁井田陞先生以后，把中田薰先生和仁井田陞先生所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事业确实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池田先生正是这一新阶段的重要代表。

三 中国古文书学规范化的追寻

1992年,池田温先生主编的《讲座敦煌》5《敦煌汉文文献》出版,并于其中发表了《契》与《敦煌写本的价值——附论写本真伪问题》^[26]。

关于《契》的研究与发表,前后绵延了数十年之久。1973年发表《中国古代租佃契》上篇^[27],1975年发表中篇^[28],1992年发表下篇^[29]。二十年间完成一个论题,表现出作者锲而不舍的精神。近年又在山本达郎先生主持下,出版英文《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集》系列,其第3卷为Contracts(契约文书),含520件(其中敦煌契251件)。1986年发表《中国古代契约文书的整理》^[30]、《吐鲁番、敦煌契券概观》^[31],将10世纪前古代契券遗物499件做成目录,根据《吐鲁番出土文书》第7册补记了5件契约名称^[32],并改正了若干录文。

《契》一文是上述长期工作的总结,分为买卖契、交换契、贷借契、雇佣契、遗书与分书、身份解放证书、契的书仪诸类。

池田先生指出:“可以认为,契的多寡的分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社会的现实。件数上敦煌契可与吐鲁番契相匹敌,敦煌契中缺乏房屋租借和铜钱利息的记载,但比起缺乏书仪、分书、放书、养男契的吐鲁番契,毋宁说敦煌契种类丰富些。与城市性的吐鲁番比,保留着农村性质的敦煌,其住房租赁契比较少见,此点容易理解。”这是通过契的综合研究所做的综观的社会史的考察。

本文还提出了未来的课题:巴楚县发现塞语系方言文书(8世纪顷),使用作为Kapci(画指或押指)的线指印,表明显然是受了唐契的影响。吐蕃、西夏、回鹘文契约中,中国契的书式及用语的影响随处可见。另方面,8世纪以降的古代日本契直接继承了唐契,并有几处表现出日本化。研究敦煌汉文契与周边民族的契

约文书是将来饶有兴味的课题^[33]。

籍帐文书整理（《中国古代籍帐研究》）、法律文书整理（英文本 Legal Text）、契卷整理（英文本 Contracts、《契》《中国古代契约文书的整理》）、文书识语整理（《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其他文书整理（《敦煌的便谷历》^[34]等）是池田温先生 40 年来古文书学整理的几大系列，其中凝结着池田先生对中国古文书学规范化的不倦追求。

古文书学在欧洲称为 Diplomatics。年鉴派大师兼创始人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在《历史学家的技艺》（又名《为历史学辩护》）中写道：“1681 年《古文书学》的问世，标志着档案文献考据学的创立，这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35]

在日本，欧洲意义上的文书学建立很早，同时又吸收了汉字文化圈中的丰厚传统。在史料方面，明治天皇即位后，即下令现在设在东京大学内的日本史料编纂所编辑《大日本古文书》。《大日本古文书》不仅是日本民族的一项伟大的文化财，也对研究中国唐代公文、律令及建立中国的 Diplomatics 有着重要的启示。

在战后的艰难年代，以东洋文库为基地，榎一雄、山本达郎两先生自英国引进缩微胶卷，大大推进了日本的敦煌吐鲁番学。池田温先生除了这一学术传统外，在古文书上，还可上溯到西川宁先生的传统，以及令尊老池田先生的家学渊源。

西川宁（1902—1989）先生是日本书道界最早接受文化勋章的先生，是 20 世纪后半期代表性书法家，对孕育了汉字的中国传统文化有一种稀见的倾倒和深厚的理解。1962 年发表的《李柏书稿年代考》是以书法家身份参与古文书研究，对于西域史研究的深化是一次重大的参与。大作是简牒与纸文书的一次综合讨论，考证出李柏再任于 345 年，致焉耆王书写作年代为 346 年 6 月。西川先生对池田先生有良好的影响^[36]。

池田先生对古文书学规范化的追求有如下特点：

1. 研究文书从识字始,从提高汉字辨识造诣入手。池田先生由于令尊老池田先生及其书道界友人西川宁先生等的熏陶,由于岳父杰出的汉语专家仓石武四郎先生的影响,对汉字学识造诣颇深,对汉字书体历史有很高的感悟力和可信的直觉观察力,因而池田温先生综合书法史及其他各要件,对于一些无纪年文书的年代判断常有独到的成就。

2. 尽可能研读原件,从原件出发,详作注记。

3. 提倡科学而又谨慎的辨伪,其慎重态度特别值得称道。1992年,池田温先生于《敦煌写本的价值——附论写本真伪问题》中指出,在所编《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的2620余件识语之中,有关真伪方面可疑物为106件,附以“疑”字表示。池田先生对于目下将中国、日本散存的敦煌等西域出土品过度地视为赝品的见解不敢苟同。池田先生《识语集录》中的疑伪,是根据识语的外形,以及与内容相涉的真品中得见此中疑点的。池田先生与曾经旅日的施萍婷、陈国灿、荣新江诸先生均讨论过流散文书的辨伪问题。池田先生认为:“中国有编纂敦煌写本总目的意向,希望把非真品也作为附录收载,将真伪不明的写本列为一组,与已确定为真品、伪品的相区别,这样较为适宜。到将来研究进展中,判别后再决定所属。敦煌写本群具有人类文化史上的不朽的价值,鉴别作业的进展,当应进一步发扬。”^[37]池田先生的慎重态度值得称道。

4. 严格录文的规范。在《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一书中,池田先生完善了录文的规范,记明年代、原题或拟题、正文各行番号。录文凡例中又以各种记号表明异体字、俗字、通用字、残存字记号,前后缺记号,例补记号,异于本文笔迹文字、朱字、朱点、朱勾、朱印、抹消文字、印鉴、原纸缝、原来不连接断简等等。

5. 严格注记的规范。录文末尾的注记(原本收藏藏家、登录号、尺幅、缝背注记、目录著录、图版刊行、别家录文)、纸背及